

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 “科玄论战”

连冬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

连冬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连冬花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7. 1

ISBN 978-7-5473-1041-0

I. ①知… II. ①连… III. ①人生观—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274 号

知识与权力视域下的“科玄论战”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12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041-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江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项目
《近代中国的民主历程及其经验研究》(2015JDZD07)

江南大学教改项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探究式教学方法研究与应用
(JG2015069)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关于“科玄论战”	1
第二节 关于知识与权力	11
第三节 从知识与权力视角研究“科玄论战”	32
第二章 “科玄论战”之缘起	47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差异性	47
第二节 文化冲突与社会信仰危机	59
第三节 文化冲突背后的“利益”之争	68
第三章 “科玄论战”中的知识因素	75
第一节 玄学派成员的知识来源	77
第二节 科学派成员的知识来源	91
第三节 唯物史观派成员的知识来源	102
第四章 “科玄论战”中的权力因素	122
第一节 “科玄论战”中各派的社会力量	122
第二节 “科玄论战”中的话语权	156
第三节 “科玄论战”背后的权力之争	180

第五章 “科玄论战”中的知识与权力	199
第一节 知识影响权力	200
第二节 权力促进知识生产	212
第三节 知识与权力的互动	227
结语	251
主要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关于“科玄论战”

一、“科玄论战”始末

1922年,张君勱陪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回到中国。杜里舒在中国讲学期间,曾长时间主讲于清华大学,而作为翻译人的张君勱也较为清华学生所熟悉。1923年2月,清华学生吴文藻等人邀张君勱讲演“人生观”问题,张欣然前往。^①演讲内容后发表在第272期的《清华周刊》上。《人生观》这篇演讲强调科学有一定的范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唯有反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也。”^②即人生观问题,非科学所能解决。这就为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划定了科学的范围,实质是对科学的范围作了限制。张君勱的人生观演讲,引起了好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这位“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的反对。同年4月1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向张氏发起抨击,于

① 李达生:《国土:张君勱先生》,郑大华编《两栖奇才》,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1页。

② 张君勱:《人生观》,《晨报副刊》1923年5月2日。

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爆发。因为科学派主将丁文江把人生观称为玄学,所以,科学与人生观之争被称为“科玄论战”。

“科玄论战”是“一场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参与其事”。^① 参战的人物有张君勱、梁启超、张东荪、翟菊农、丁文江、任叔永、胡适、王星拱、吴稚晖、孙伏园、林宰平、章演存、朱经农、唐钺、陆志韦、范寿康等,也包括后来参战的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他们依据自己的信仰以及对科学的不同认识结成不同派别。一边是以张君勱为代表的玄学派,一边是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陈独秀等是后来代表唯物史观派参战的。张君勱发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来反攻,丁文江又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勱》来交战,后张君勱在中国大学讲《科学之评价》,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双方短兵相接,交锋不断。

自论战爆发后,双方各以自己的报刊为舆论阵地进行交战。《努力周报》停刊时,胡适说过这样的话:“《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治,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勱一班先生的文章和《读书杂志》里讨论古史的文章。”“如果《新青年》能靠文学革命运动而不朽;那么,《努力》将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是靠那些政治批评——这是我敢深信的。”自从《努力周报》第48期发表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向张君勱发起进攻后,那一期的《努力周报》暂停了“这一周”时评栏目,专门留出篇幅给丁文江反驳张君勱的文章,由此拉开了这场大论战的序幕。国内众多的名流学者纷纷参战,于是《努力周报》就成为科学派的阵地,那些信奉科学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丁文江为中心,以《努力周报》为媒介,聚集成为一个科学的共同体联盟,宣传自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71页。

己的思想及主张。自从《努力周报》对玄学派发起攻击后,玄学派也不甘示弱,他们以张君勱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孙伏园所在的北京《晨报》为媒介,以梁启超、张君勱为中心,发起对科学派的反击。“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①

论战开始不久,梁启超宣布了关于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胡适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勱》,以局外人自居,持中立态度。但后来,两人还是忍不住参战了,梁启超写了《人生观与科学》,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其他人如唐钺发表《心理现象与因果律》、《一个痴人的说梦》攻击梁启超,此外还发表《“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科学的范围》、《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其他有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王星拱《科学与人生观》、朱经农《读张君勱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章演存《张君勱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陆志韦《“死狗”的心理学》、林宰平《读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范寿康《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张东荪《劳而无功》、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与《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菊农《人格与教育》,以及孙伏园《玄学科学论战杂话》、颂皋《玄学上之问题》、甘塾仙《人生观与知识论》、王平陵《“科哲之战”的尾声》、穆(钱穆)《旁观者言》等文章。等到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和上海泰东图书局收集论战文章,分别整理汇编成《科学与人生观》和《人生观之论战》,发现论战文章字数居然“煌煌二十五万”。就参战文章字数而言,就足以说明这次论战的规模了,但论战并没有由此结束,当两书准备出版发行时,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收集论战文章编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请胡适和陈独秀分别作序,上海泰东图书局收集论战

① 胡适:《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1923年10月21日第75期。

文章编为《人生观之论战》请张君勱为之作序,三人分别在自己作的序中陈述了各自的观点,这些观点又把论战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如张东荪所说:“科玄论战本有在不得要领中下火之势,不意忽有这三篇长序的挑衅,好像又有重开的样子。”^①确实,三篇长序把“科玄论战”推向了三足鼎立的状态,即“科玄论战”由两派变成了三派^②,即玄学派、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后两者也可以统称“科学派”,但它们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自从唯物史观派参战后,不仅论战战线拉长,而且论战的话语权也开始发生变化。唯物史观派最初和科学派联合批判玄学派,而后对科学派进行了批判,主导了论战方向。面对唯物史观派的批判,梁启超写了《非“唯”》一文,批判陈独秀的唯物史观,陈独秀则写了《答张君勱与梁任公》,瞿秋白写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勱》,邓中夏写了《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等文章回驳,由于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符合了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需要,所以“科玄论战”最终以唯物史观派的胜利而暂告结束。但是各派观点在论战过程中都没有得以充分展示,以致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三派的观点还是不断再起。可见,“科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至对中国

① 见朱耀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② 一般材料上把“科玄论战”理解为科学派和玄学派的论战,所以到胡适宣布科学派的胜利时就确定了论战的基本结束。但是如果从内容上看,“科玄论战”不仅仅是科玄两派的论战,而且还包括唯物史观派。因为“科玄论战”实际上是有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科玄两派并没有真正对两者的关系作出正确的理解。在唯物史观派参战后,紧紧围绕着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进行说明和论证,唯物史观派的参与才真正对科学、人生观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和批判。所以,胡适宣布科学派的胜利、论战书籍的出版不是确定论战是否结束的根据,根据内容的内在一致性和连贯性才是比较好的确定依据。因此,在本著看来,“科玄论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以胡适宣布科学派的胜利为一阶段,二是自唯物史观派参战后到基本结束为另一阶段。“科玄论战”是由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参加的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论战。

历史思想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科玄论战”的问题

“科玄论战”所讨论的问题,正如其规模一样是宏大的,如科学、玄学和人生观的定义、关系,哲学与玄学的关系,科学与哲学的范围及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认识论问题,等等。具体总括起来,论战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包括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还有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讨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文化创新和本土文化、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发展与社会信仰的关系,等等。所以,“科玄论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当年的参战者和后来的众多评论者都给予过很好的评价。[只有极少数的人对这场论战的意义予以贬抑。如已故的西方著名中国思想史家列文逊(J. R. Levenson)指出:“任何对科学与玄学有兴趣的人不必对此论战多看一眼。”^①]梁启超认为,“科玄论战”所讨论的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可庆幸的现象”。^②胡适称这场论战为“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他说:“丁在君先生的发难,唐擎黄先生等的响应,六个月的时间,二十五万字的煌煌大文,大吹大擂地把这个大问题捧了出来,叫乌烟瘴气的中国知道这个大问题的重要,——这件功劳真不在小处!”^③对此,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中评价说:“这一场大战的战线的延长,参战武士人数之多,战争的旷日持久,可算是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陈独秀认为,“科玄论战”是中国学界的进步;罗志希(家伦)说:“1923年5月间,黎元洪君出走的消息,

① 朱耀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梁启超:《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晨报副刊》1931年5月9日。

③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钟离蒙、杨凤麟编《中国现代哲学史料汇编》(第一集第七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1年版,第102页。

与张君勱、丁在君两君辩论‘科学与玄学’的消息同时传到纽约。黎君出走的电讯,不曾萦绕我五分钟,而张、丁两君往返辩论的文字,倒费我半天的时间。因为张、丁两君这次的辩论,比黎元洪出走一事,重要得多。”^①郭湛波称这次论战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论战”;谢扶雅称这场论战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继东西文化论争之后更富有意义价值的一场大争辩”。^②

现代学者对这场论战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美国学者夏绿蒂·弗思(或费侠莉)认为“科玄论战”所表明的是“中国第一次开始正式企图探讨西方哲学问题”。“科玄论战”本身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不同流派在中国学界的争论,是对西方哲学作出的贡献。台湾学者林安梧指出:“丁文江和张君勱对垒,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论战可视为当代新儒家的方向起源。”^③武汉大学李维武说:“科玄论战”“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尖锐地提出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次论战对科学与哲学的意义范围、思维特点、社会功能、相互关系诸问题所展开的一系列论争,最后都归结为对哲学本体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这一根本问题,从而突出了本体论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④还有学者如郭汉民把“科玄论战”看作是一场规模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洪晓楠认为“科玄论战”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⑤

在论战中,由于涉及问题众多,导致没有明确抓住论战的要领,且诸多问题随论战的展开而增加,以致各种认识观点并没有随论战的结束而有明确的结论,有些问题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

① 罗志希:《科学与玄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页。

② 谢扶雅:《我所了解的君勱先生》,郑大华编《两栖奇才》,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35页。

③ 转自朱耀垠:《科玄论战以及回声》,上海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④ 同上。

⑤ 洪晓楠:《“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的发展》,《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

越突显出来,需要作进一步的讨论。尽管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论战作了多角度的研究,但论战所包含的内容、意义还没有全部得以挖掘,特别是唯物史观派为什么能够在论战后期不仅取得话语主导权,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论战之后逐渐占据社会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

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社会的信仰,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指导地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对苏联解体的反思,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而又不“唯我独尊”,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从“科玄论战”的源头挖掘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历史生成过程,这对于以上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科玄论战”的研究现状

发轫于五四时期的“科玄论战”,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历史上曾有过几次研究热潮,但随着中国社会思想界发展侧重点的不断变化,却逐渐淡化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种种中西文化关系的难题,“科玄论战”又一度成为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进入21世纪后,相关研究又重新冷却了,但“科玄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包含的内容和意义并没有得以全部挖掘,还需要进一步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1.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国外很少有学者对“科玄论战”作专门研究,主要是在论述与之相关的问题时,涉及对论战的看法。其主要观点有:

(1) 认为是科学权威在中国取得了胜利,^①代表人物郭颖颐。

① [美]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他们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论述了科学具有的普遍有效性特征,认为科学派的胜利,是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科学权威的胜利。从实证主义视角论述论战,不会涉及权力等社会因素,也不会考虑权力因素对论战本身的影响,也不可能挖掘出权力因素背后隐含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2) 夏绿蒂·弗思认为“科玄论战”所表明的是“中国第一次开始正式企图探讨西方哲学问题”。^①“科玄论战”本身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哲学不同流派在中国学界的争论,是对西方哲学作出的贡献。不过,她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思想时,传统文化背景对他们的影响,也暗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对争论双方都发生的影响,就是说她的分析潜藏了文化资源对论战内容的影响,但没有对不同文化资源背后可能代表的权力、利益因素作出任何说明或暗示。

(3) 认为是当时知识界把西化与现代化混为一谈,坚持西方现代文化是有机整体观点的结果,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他们看到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别,指出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重要性,从本土文化的视角批判了“全盘西化”的错误,但没有涉及权力、利益因素,不可能指出在文化发展过程中,权力是如何影响其进程或方向的。

(4) 周策纵把“科玄论战”看作是直觉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实质上是把论战看作是中西文化的论争。^②

(5) 林毓生在《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之史的涵义——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例》(为纪念张君勱先生百年冥诞而作)中,以“科玄论战”为例,从传统文化的“天命观”及“天命观”所支持的文化系统的分解入手,分析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理解为什么浮泛

① [美] 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8 页。

②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0 页。

的原因。他还在《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涵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论争”的省察》中“具体地与分殊地解释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质素通过中国固有的母膜(matrix)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后所发生的影响”，^①分析了论战中双方思想资源是如何受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制约的。林毓生看到了传统社会资源对知识分子认知新事物的影响。

(6) 用知识与权力视角对类似争论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夏平和沙弗尔，他们把发生在17世纪60年代波义耳和霍布斯关于“空气泵”的争论看作是权力、利益之争，波义耳的胜利是权力、权威的胜利，而非知识本身的胜利。他们在知识与权力的视角下，看到了权力、利益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无视自然本身的客观性，完全用社会因素解释事实本身，因此，在理论上是片面而缺乏说服力的，作为历史事件的“科玄论战”和关于“空气泵”的争论在本质上有根本的差异，但是，关于“空气泵”争论的研究视角对“科玄论战”的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

2.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国内学者对“科玄论战”论述较多，从不同的视角对论战作了有针对性的论述。对论战实质的揭示，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认为是意识形态之争，代表人物有李泽厚^②、周青丰^③。他们看到论战是两种不同思想对中国学界和政治界话语权的争夺。但是他们把“科玄论战”划入意识形态的范围，用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科玄论战”进行分析，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① 林毓生：《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社会思想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90页。

②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③ 周青丰：《科玄论战性质新论——以科玄论战中的丁文江为中心的考察》，《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2) 认为是东西文化之争,代表人物有周云^①、冒荣、柴文华。他们看到了论战的实质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理性与价值的冲突,看到了中西文化本身的差异,分析了两种不同文化碰撞时必然要发生冲突的原因,但没有意识到文化之争背后权力的因素,没有把这种争论看作是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过程中短暂而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3) 认为是对科学功能的不同认识的争论,代表人物有段治文^②、李申。他们看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不同人群对科学的不同认识,但仅仅从科学的社会功能来分析“科玄论战”,有点脱离论战发生的历史背景,没有看到五四之后中国学界儒学与西学冲突的发展过程,仅就事件本身进行论述,看不到不同价值背后蕴含的社会因素及其对论战的深刻影响。

(4) 章清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从权力的角度对以胡适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了分析,揭示出不同知识分子派别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认为“科玄论战”对“胡适派学人群”争夺“学术霸权”具有意义,但他没有对“科玄论战”本身作具体的分析,也没有从理论上明确指出“科玄论战”本身存在对权力因素的争夺。

(5) 刘义林等把“科玄论战”与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科玄论战是近代化—现代化的努力与对其进行反诘、反思,企图‘对治’其不良影响的努力之间的一场论战”。^③在文章中,作者指出:“科玄论战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公平论战,科学派不过是通过驳斥对手的言论,继续拓展科学王国的版图。”^④但是,作者的落脚点是要说明张君勱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上的先见,

① 周云:《从“科玄论战”看20年代西方思想与中国社会思潮》,《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6期。

② 段治文:《科学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③ 刘义林等:《张君勱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④ 同上,第91页。

而不是把“科玄论战”本身看成是存在权力因素的斗争。

(6) 此外,还有学者如郭汉民把“科玄论战”看作是一场规模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①方松华认为“科玄论战的实质是 20 世纪国际哲学思潮在中国的回响,它开拓了‘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②;洪晓楠等把“科玄论战”看作是文化哲学事件;李醒民则对“科玄论战”的历史意义作了当代性反思;宋志明认为“科玄论战”是实证主义在中国发展到巅峰的表现;黄玉顺把“科玄论战”变成一个“哲学的”、“思想的”问题;而洪峻峰则认为,不能把“科玄论战”简单地归结为中西之争或新旧之争,应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理学与反理学之争的再现。^③ 总之,所有这些对论战的分析视角,基本上没有触及权力因素及其对论战的深刻影响,很难从权力角度为不同文化之争提供一种历史的典范。

第二节 关于知识与权力

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两者存在时就存在,但两者的关系,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古典意义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是一致的,因为当时科学与哲学还没有分化,知识的界定和划分还处于朦胧状态,日常经验知识、政治知识、科学知识都是知识,彼此之间没有好坏之分。随着科学与哲学的分化,知识出现了专业化,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出现了界限,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变成外在的。随着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人们发现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社会因素,权力因素进入知识的

① 郭汉民:《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岳麓书社 2004 年版,第 374 页。

② 方松华:《现代多元学术思潮》,尹继佐、周山主编《中国学术思潮史》(卷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0 页。

③ 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52 页。